

往事如昨

地瓜干换酒往事

刘甲凡

生产队那些年，社员的口粮每人每年平均360斤原粮，再按照“人七劳三”的原则分到各家各户。人七劳三，即人头（基本口粮或供给）占70%，劳动工分（工资）占30%。这样算下来，平均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粮食，又很少有其它副食品，绝大多数人家都粮食不足。因此，当年农村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：“够不够，三百六。”

为了能填饱肚子，生产队便采取多种地瓜的办法。与小麦、玉米等其它农作物相比，地瓜耐旱，适合山地栽种，产量也相对高一些。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按5斤地瓜折算一斤口粮分给社员，这样就可以缓解口粮不足的问题。

每年霜降前，生产队就把地瓜分到各家各户，劳力多的人家就能分得上千斤。为防止变质腐烂，鲜地瓜不能储存太多，多半地瓜都是晒成地瓜干了。随着三年灾荒年月过去了，逢年过节，爱好喝酒的人也可以用地瓜干换点白酒“开开斋”了。

1958年11月，牟平酒厂成立，从青岛购进酒精，用地瓜干沿用民间传统的固态法酿造白酒，酒名就叫“牟平白干”。自1962年开始，在随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，价格一直稳定在每斤一元钱左右。虽然价格很便宜，但在那时候，农村多数人家还是消费不起。这种情况下，地方政府就出台了用地瓜干换酒的政策。记得有两种兑换方式：一种是3.5斤地瓜干换1斤酒，但还要付给厂家一毛八分钱；另一种兑换法是5斤地瓜干换1斤酒，就不用另外付钱了。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家庭，大多数采用后面这种兑换方式。

虽然生活困难，平日里也不能经常喝酒，但每逢过春节的时候，还是要用酒来招待客人的。这样一来，每年入了腊月门，牟平酒厂的大院里就经常出现排着长队换酒的场景。

我13岁那年腊月一个星期天，妈妈要我和哥哥去牟平酒厂用地瓜干换酒。从我们家到城南关的酒厂有十里的路程，哥哥背着十几斤地瓜干，我背着一个能盛3斤酒的绿色大瓶子，两人走一会儿歇一阵子，一个多钟头才赶到。进了酒厂北大门，看见已经有长长的一大队人在那儿等着了。排队、过秤、开票，这是一个非常耽误工夫的过程。工作人员不慌不忙、不急不躁，挺沉得住气，排队换酒的队伍只能缓慢地向前挪动。

不知不觉到了中午，酒厂下班，还排着长长的一大队人等在那里，没办法，只能等到下午了。天气虽然有点冷，我们也只能坐在自己的瓜干袋子上耐心等待。早饭吃的是烩地瓜，一点也不耐饿，走了十多里路，又排了半天队，肚子早就咕咕叫了。哥哥就解开装地瓜干的面袋子，找出几片干净的地瓜干，我俩“咯嘣、咯嘣”嚼着吃了，算是把饿肚子糊弄过去了。

终于等到酒厂上班，排到了我们过秤。工作人员给开了票，转过身我们又跟着去排队打酒。酒库里一排排摆着好多个大酒缸，酒缸中溢出来的酒香顺着门口飘出来，清冷的微风中飘荡着绵绵的香气。

冬天日短，等我们赶回村子时，太阳快下山了。村头上站着一堆人，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堂爷爷。他看我们换酒回来，就凑了过来，没事找话说，我哥哥随便客气了一句：“爷爷你喝酒吧。”不承想，堂爷爷答应了一声“好”，接过酒瓶拔下高粱秸秆做的瓶塞，一仰脖，“咕嘟咕嘟”几大口就灌进肚子里了。虽然我们两个都舍不得，可说什么也晚了。回家后，把这事对妈妈说了，妈妈按照我们比量的高度，说堂爷爷这一家伙喝了至少有半斤酒。

事过多年想起来，堂爷爷那时家里太穷了，自己馋酒又买不起，逮住这么个机会，根本就不顾得脸皮这回事了。

说起到酒厂换酒，当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小笑话。说是辛安村有个女孩推着地瓜干来换酒，可带来盛酒的“酒嗓子”（盛酒的陶罐，牟平方言叫酒ning子）太小了，装满后还剩下半来斤酒。就这样撂下吧又舍不得，可如果买酒厂的一个酒瓶则需要一毛二分钱，她身上连一个钢镚也没有。也是这女孩不知56度牟平白干的厉害，在几个人的揶揄下，居然一口气喝下去了。

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家，又是第一次喝酒，走出不远就天旋地转起来。趑趄起好不容易挨到城西关桥头，小推车一头撞在路边石墩上，酒嗓子摔碎了，她也躺下动弹不得了。多亏遇到当时任生产队长的李德海，安排人把她推着送回家了。

也是因为到牟平酒厂换酒，我还有过受生产队处分这么一回事。

那是1967年，趁着老秋少雨的当口，我们小车队在村南的玉皇庙水库清淤。离那里不远有一片碎石遍地的山坡，生产队刨地瓜的时候在那里晒过地瓜干。拾掇地瓜干的时候，是学校的老师领着小学生干的。小孩子毛手毛脚，落下了不少“地瓜干耳朵”，也就是一面带皮的地瓜干。小车队队长他们几个一嘀咕，就安排我去把这些“地瓜干耳朵”捡起来，拿去牟平酒厂换酒喝。我那年17岁，是小车队里年龄最小的一个，什么也不考虑，就按照小车队队长的安排，一家伙捡了30多斤“地瓜干耳朵”，然后骑着自行车到酒厂，换回差不多8斤酒，让那些“酒鬼”们美美地过了一回酒瘾。

隔了一天，这件事被人告到村支书那里，一下子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当时全国上下正处在“斗私批修”阶段，人人都要“灵魂深处闹革命”“狠批私字一闪念”。我们用集体的地瓜干换酒喝，那就是彻头彻尾的“资本主义倾向”，必须认真检查、严肃处理。就这样，小车队队长和我被定为“主犯”，不光在社员大会上做了书面检查，还要负责把地瓜干按照原数收集起来交还生产队。说起来我实在是冤枉，因为那天的酒我一口也没喝。

今年4月，在位于牟平的烟台恒邦酒业有限公司参加了《烟台晚报》举行的笔会活动。笔会期间，听了尹浩洋先生声情并茂的报告，触景生情，就想起了这几段过往的小故事。当年的辛酸事，现在想起来还蛮有趣的。

乡村记忆

养蚕者说

臧栋

中国的蚕桑文化博大精深，据考古专家推测，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中期，中国便开始养蚕、取丝、织绸了。对于我家来说，养蚕是一门生计。自我十岁起，家里便开始养蚕，如今已近而立之年的我，每每于街市中看见“遍身罗绮者”，便不由得想起曾是“养蚕人”的父亲母亲。

蚕只食桑叶，欲养蚕必先植桑树。我家有两亩多桑树，都是父母一株株亲自栽种的。桑树的管理一点都不省心，光是修剪一年中就得三次。春天剪歪枝，需弯腰；夏天剪枝头，需踮脚；冬天剪枝根儿，需下蹲。母亲颈椎不好，父亲腰椎不好，每日劳作归来，还要刷洗养蚕所用的簸箕，给蚕舍消毒，一直到夜里才能停歇。年幼的我心疼父母这般劳累，有时会稚气地说：“妈，把那些桑树都刨了吧，你跟我爸轻快些！”母亲笑着责怪道：“刨了树谁供你上学呀，那可是摇钱树，你可要好好念书啊！”

几年后，我和桑树都慢慢地长大了，我家的养蚕事业也步入了正轨。年分四季，蚕养三茬，春夏秋各一茬。蚕的成长，就像苦行僧的修炼，需经过五次脱胎换骨的变化才能最终化茧成蝶，养蚕术语中称之为“五龄”。伴随蚕儿痛苦成长的，是养蚕人的万分艰辛。

头“四龄”的蚕，主要由母亲照料，父亲则在外头干点木匠活补贴家用。母亲是细心人，每个环节都照着“书上说的”做，不仅把蚕儿养得白白胖胖，蚕舍也拾掇得干净利落。她嘴上常常念叨：“凡事只要用心去做了，都会有好的结果。”而那时的我，每天最喜欢的就是跑到蚕舍里，看着蚕宝宝吃母亲喂的桑叶，然后一天天长大。

第“五龄”的蚕，于蚕于人，都是万分痛苦的。蚕儿为了攒足化茧成蝶的能量，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吃桑叶，这个过程至少要持续七天，且食量一天比一天大，俗称“吃老食”。大片的桑叶撒到蚕儿身上，屋里立刻响起沙沙的吃食声，那声音，像极了春雨沙沙，甚是悦耳。可养蚕人顾不得欣赏，这沙沙声更像是蚕儿嗷嗷待哺的呼唤，催促蚕农每天不间断地采桑叶、洗桑叶、喂桑叶。大家都明白，谁家蚕儿“老食”吃得多，谁家蚕茧产量就高，

卖钱就多，“重赏”之下，养蚕人个个都成了“勇夫”。

父亲是个十足的“勇夫”，他像不知疲倦不停吃食的蚕儿一样，昼夜有干不完的活儿，消毒、除粪、采叶、喂食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如果赶上假期，我们一家三口齐上阵，最难忘的是采桑叶，每人一行桑树，比赛开始，你追我赶，有说有笑，结果总是父亲“战胜”我们娘俩。通过竞争可以提高劳动效率，在我家得到了充分的验证。父亲每年都是村里的“养蚕状元”，他后来还当上了技术员。

因为学业，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可不管养蚕有多忙，每次回家，必有我最爱吃的好吃的。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母亲心疼地说：“正是长身子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吃饭啊，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学习啊！”那年因故学校提前放假，我没有通知父母便径直回家，到家时是午饭时间，父母在小饭桌前吃着煎饼卷大葱，桌上除了一碟辣菜疙瘩别无他物，顿时，我眼泪止不住地掉下。父亲责怪地说：“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让你妈做点好吃的。”

蚕要养得好，桑树必须照料好。父亲坚持使用农家肥而不是化肥，这农家肥便是鸡粪。养鸡户将鸡粪出售给养蚕户，需要养蚕户自己开车去拉。有一次，父亲拧不过我，答应让我体验一下生活，可到了现场我后悔了，长满蛆虫的鸡粪看一眼便让人作呕，更不用说穿着雨鞋在里面挥汗如雨干活了！我最终坚持了下来，父亲却被母亲好一顿责怪。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，我家的桑叶绿得发黑，长喜人，为好的收成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桑树的年轮长了一圈又一圈，可爱的蚕儿养了一茬又一茬，我的书却越念越远，最后扎根在了城里。我想让父母早点享享清福，别再养这辛苦蚕了，可二老总说：“现在养蚕行情越来越好，城里花销又大，再养几年多少给你些帮衬，等你结婚生娃了就不养了……”

光阴荏苒，父母当初养蚕的目标已经一一实现，我家养蚕的故事也画上了句号，但养蚕的精神却一直激励着我在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行。

